

Y 726/3

山西文史资料

一九八六年第三辑

(总第四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刘 存 善

责任编辑：赵 文 朴

目 录

日俘“残留”山西始末

—— 一个日本战犯的自供状·····	
〔日〕城野宏著 叶昌纲 金桂昌等译 叶昌纲校订	(1)
序·····	(1)
一、残留思想的萌发·····	(9)
二、日本无条件投降·····	(33)
三、“日本人的立场”与“祖国复兴”·····	(41)
四、城镇沸腾起来了·····	(47)
五、大规模残留日军的组编·····	(57)
六、国共冲突·····	(65)
七、三人小组与特务团的伪装解散·····	(70)
八、暴风雨的前夜·····	(78)
九、战云密布·····	(96)
十、溃灭·····	(123)
十一、太原被围·····	(141)
后记·····	(160)
译后记·····	(161)

附录:

安平会议前后所见·····	王谦甫 (163)
对赵承绶《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 情况》一文的订正·····	曲宪南 (171)

日俘“残留”山西始末

——一个日本战犯的自供状

〔日〕城野宏著 叶昌纲 金桂昌等译 叶昌纲校订

编者按：城野宏是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了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提出日俘“残留”山西的谬论，诱胁日俘和日侨万余人“残留”山西，企图以山西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新形势下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他的谬论与阎锡山企图利用日俘维持他的反动统治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双方继续勾结，在解放战争期间进行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篇自供状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日俘“残留”山西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始末，虽不全面翔实，但却是研究山西地方史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特译出供读者参阅。

除书名外，译文照原书直译。人名用字有错误的，内容不确并已为编者发现的，均加以说明，原文和译文如有不妥之处，欢迎知情者和有关专家予以指正。

序

战后已二十年了。五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使幼年变成了青年，使青年变成了老年。在青年们的记忆中，有关战争的悲惨体

验已荡然无存了。而且，即使是老年人和壮年人，在回忆其战争体验时，因事过二十年之久，恐怕亦颇有健忘之处。如果按照“十年一昔”（即每过十年就有很大的变迁之意——译者）的俗话来说，那已成为二昔前的历史课题了。因此，其印象逐渐淡薄，也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在目前，像越南战争这样新的事件正席卷而来，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战经验等等，仿佛已被人们视为与己无关的、遥远世界的变故。然而，在那二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许多活着的日本人，受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甚至是民族诞生以来未曾体验过的全面失败和投降的触及灵魂的打击，而这对于能够明辨是非的人来说，就成为想消除也消除不了的深刻回忆。

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对失败所采取的态度，不同的阶级、阶层和个人是各不相同的，而且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同，各自所感受的内容也不一样。有的人因狂妄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日本倒台而自由欢唱，有的人想到“光辉的大日本帝国”和“万世一系的国体”的覆灭，则咽下了悔恨的眼泪。在国内，面对废墟、残骸和饥饿，或者经常发出绝望的悲叹，或者勇敢地挺起胸膛，决心在这个废墟上重建祖国。

在海外的数百万日本人，以往是处于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地位，但因顷刻崩溃，却作为惨败的俘虏而沦为被统治者。过去以军事压制为基础，傲慢地看待其他民族的统治者，现在慑于敌意与仇恨的包围，感到复仇的凶刃迫在眉睫，因而在心中常常产生一种恐惧的哆嗦。有的人一朝丧失以前在大陆积累起来的财产和权益，不知如何是好，又因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只好叹息自己那种除暂时返回化为焦土的故国之外而一筹莫展的悲惨命运；有的人因为感到社会主义人民革命就在眼前，同时又冷眼相看过去的统治阶级，所以急于回国；有的人感到在被连续而可怕的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时候，突然出现的和平，不管怎样，使自己从死神的

威胁中解脱出来，因此不知因为什么，好像快乐的生活就在等待着他们，从而得到了内心的宽慰。……这些想法，无论是在军队中，或者是在民间，都是一致的。而且，不管怎样，在实际行动上，总的趋势是一心一意地想回故国。

然而，同这种堪称总崩溃的归国潮流相反，另一部分日本人却留在以胜利者的姿态而君临日本人之上的敌国之中，并利用其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关系，寻求使当地的丰富资源为重建祖国服务的道路。这就是说，因战败而无条件投降的日本，以其相当严密的有组织的军队和政治势力，残留在战胜国的中国，在相当于西欧的大国那样大小、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山西，培植其所控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使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如果更具体而直接了当地说，是把山西的煤铁资源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燃料、炼铁和其他原料的供应地，即把战胜国一部分的山西省从中国的独立体制中分裂出来，使其重新成为战败国日本实际的殖民地。

这件事如果按现在日本的常识来看，也许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妄想。然而，这被看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甚至被作为妄想家随心所欲的狂言，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从当时山西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件事决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是有着极大的现实可能性的事情。而且，这也不仅仅是根据可能实行的推测而制订计划的所谓脱离现实的或头脑中的问题。这件事付诸实施，并在战后四年间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将为日本的经济复兴创造实际援助的基本条件。

战争结束后，散居在亚洲各地的日本人，都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设想着重建祖国的问题。中国、朝鲜、东南亚，虽然条件各不相同，但“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并没有因战败的突然打击，就那样急速地从人们的脑际中消失，相反，仍然颇有活动市场，所以抱着残留希望的人似乎也是很多的。当然，由于以军队

为后盾的日本人的权威和“指导性”，不知不觉地被日本人自身的优越性所代替，所以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错误地觉得日本人的个人能力是极强的。因此，不少人在战后还残留那里，满怀作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希望，打算在几年之内，再次恢复日本对亚洲的统治，并为此拟订各种各样的计划。然而实现这些希望和计划的现实条件，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个梦是仅仅限于梦想而已，或者是仅仅停留在计划和商谈的阶段，并随着撤退的船只带回了日本。因此，它只不过起着给人们留下一点儿罗曼蒂克的回忆作用，有时是作为个人的行动而淹没在巨大的亚洲土著的大海之中，因此除了周围的新朋友之外，再无人知道其下落。还有，投身于越南和印尼革命军中的人们，是作为个人参加革命而受到友人欢迎的，但它并未成为直接服务于日本战后建设的有组织的集团活动。

然而在中国，从战争结束的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八月直到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四月末，四年间，始而有数万日本人，即使是最后，亦有数千日本人结成有组织的军队和政治组织，残留山西，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以继续确保华北山西在日本的影响之下。这同从前受日本军部的指示和援助的几个日本人指使数十乃至数百名中国人进行活动的满洲土匪的阴谋活动或作为日军占领下补充兵员式的中国人部队的行动是不同的，它具有独立自主的综合组织的内容。这是祖国战败后，在没有得到日本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日本人以独自的力量，在中国的一隅，建立在日本人势力之下的一个独立国，而这个独立国比西德稍小一些，然而却比捷克斯洛伐克要大得多。我们控制着像朝鲜或者日本本土那么大的地区的军事、政治，是为了吸取那里蕴藏着丰富资源的经济力量，用于日本的复兴事业，而建立工厂、开发矿山和发展农业，以制造吃、穿、用等一切东西，制造武器，并用自己组织和训练的军队同入侵者作

战，以保全自己的领域。因此，那不是“夕阳与手枪”式的个人英雄谭，而是许多同心协力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采取统一的社会行动，才能实现的事业。

假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尚未达到全国的胜利，而日本在战后又能迅速恢复自主体制，并能积极采取对大陆的对策，那末山西独立体制或许至今仍然继续存在着，并将会对日本的发展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取得这种殖民地，对日本有利，还是无利，也许众说纷纭，然而无论如何，在实际上，将会给日本提供数十万吨的煤炭、铁矿石和粘结炭以及化工原料，并能获得像欧洲的大国那样的商品市场。

但是，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不可能采取对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战后的中日交通一直受到阻止，因此也就无法将山西的成果实际应用于日本的复兴事业中。而且，在那个期间，中国的内战激化了，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军事力量陷入全面的崩溃。北平、天津陷落了，首都南京也陷落了，山西变成中国革命大海中的孤岛，最后太原也终于陷落了。从而使我们亲身体验到像大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而将要倒塌那样不可抵抗的历史潮流的终结。战后四年在大陆的建设和抵抗就这样完全被破坏，残留大陆的足迹也就这样被消失在革命后无数民众的脚下。众多的日本人有组织地残留在战后的山西，确保相当的势力，并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逆水行舟，这是一个历史的奇迹。然而，它同时也是个被世界历史潮流无情冲垮的历史悲剧。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断定它是轻率的暴行或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继续，并主张它应站在审判战犯的被告席上；也有的人把它作为痛快的壮举而予以拍手称赞。对此，祖国历史的本身一定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我想与其为评价问题而伤脑筋，勿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战后史中不大为人所知的一幕吧。

提起山西省也许大多数日本人并不知道。那里确实是深山之

国、遥远的地方。从北京出发，乘京汉铁路的火车，经过半天的南下，就到达石家庄。石家庄在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改称为“石门”，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城市。从那里向西转就进入石太线。越过因韩信的背水之战而著名的井陉后，刚才还处于右边，但远远看去像城墙那样连在一起的太行山脉，渐渐逼近了车窗的侧面。这时，人们一边俯视着脚下的瀑布，一边看着火车喘着粗气，沿着由几十米、有时甚至几百米的直线似地切开的黄土和岩石的断崖，往上爬行。

一过娘子关便是山西的范围了。从此开始接触到窑洞住宅的村落和散立着枣树和榆树的梯田等黄土地带的风光，在习惯于河北平原生活的人们的眼光里，颇有进入异域之感。在煤炭之城阳泉，沿着铁道堆积着从半立方米至一立方米那样大的炭块，绵延数百米之长，这种壮观使初来的人大吃一惊。对于在一片葱绿之中长大的日本人来说，山西仿佛给人以一种不毛之地的萧条之感的印象，而在这里形成鲜明对照的，却给人留下具有不可估量的丰富的地下资源的深刻印象。

通过海拔八百米的寿阳县城，道路渐渐成为下坡。阳泉的烹调之拙劣是出名的，然而，邻近的寿阳却以烹调方面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这里有着像轻井泽那样的气候。并且是个拥有别墅等古老而幽静的城镇。从榆次这边起，视野开阔起来，并进入了山西中部的盆地，亦称晋中平原。山西省省会就位于这个盆地的正当中。太原是高原性的气候宜人的城市，是三十多年来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根据地，也是华北工业基地之一。

对于那些未到过山西的人来说，山西给人以内地未开拓的边疆之感。但是，对于知道中国历史的人来说，山西却是具有最古老文化传统的地方。战国时代，这里是晋的土地、赵的国家。而且它还是以中国文化最盛期而自豪的唐朝的发祥地，在太原附近的晋祠镇，有着唐太宗的亲笔古迹。大同的石佛、五台山的伽

蓝，天龙寺的遗迹是著名的文化财产。山西是白居易（白乐天）、傅山先生的故乡，是小说《花月痕》的故地、京剧《玉堂春》和《西厢记》的舞台。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三大美人是则天武后、汉代的貂蝉、唐代的杨贵妃，而这三个人皆出生于山西。即使是现在，到了武则天的故乡文水县，遇见含有那样端庄而容颜美丽的少女，也会使人油然产生追忆一千年前之事的心情。貂蝉在消灭董卓、延长汉朝寿命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杨贵妃出生于河南，因此，也有人说她是河南省人，然而昔日所谓河南是指汾河之南，也就是后来的河东道（黄河以东地区），如今在靠近黄河的永济县还有她的庙宇。越国的西施是有名的，然而从历史作用来看，她只不过是越王勾践灭亡吴王夫差的工具而已，属于地方性的美人。然而上述三人却是具有全国性典型的“倾城”，即倾国的美女。这样的女性被记录于史实，也说明山西作为过去的政治中心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各地，所到之处，都有关帝庙，这是曾经到过中国的人，谁也知道的事情。在庙里被祭祀的关羽就出生在山西省解县。就是现在，在其故乡解县城的西侧，还有一座相当大的关帝庙，并且在每年秋季的祭祀时，因附近一带群众的云集而热闹非凡。关羽在流浪中，于河北省涿县会见刘备和张飞，在桃园结义，并宣誓要完成天下大业。其后由于刘备在同曹操的战斗中败北，去向不明，关羽为寻找刘备、保护刘备的家属而一度充当曹操的客将，但当他得知刘备在古城时，便立即离开曹操，返回刘备身边。这就是所谓“义气如山”。而他这种决不背叛别人的义理的坚定性，受到中国民众极大的崇敬，并因此而被尊崇为整个国民的英雄。《三国志演义》是在民众中最普及的历史小说，即使是现在，关羽和张飞也还活在人们的心中。即便在成为共产党天下的今天，同村人在谈话中，只要一提起刘、关、张，马上就会倍感亲切。

晋中西部的汾阳县杏花村是酒的著名产地。汾酒被称为天下第一品，在李白（应为杜牧——译者）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中，牧童用鞭子指点的酒家，就在杏花村。这里是出好水的地方，现在建有很大的酿酒工厂，生产无色的“汾酒”和浅绿色的“竹叶青”。在日本，如今一般人所知道的“茅台酒”是贵州出产的，据说山西省汾阳酿酒工人，在贵州茅台发现其同杏花村非常相似的水质和气候条件，从而传入茅台酒的制法而制成了汾酒。

在清代，山西票号因代管政府的财政而大为兴盛起来，其势力甚至扩张到广州。由于这些票号经营者的出生地集中在中部的太谷、祁县和平遥附近，因此在这些县内的村庄中，即便是现在也还残留着一些令人惊奇的庞大建筑物。例如，有些大规模的三层楼房的建筑群，就是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其中，亦不知消失在哪里。从过去村庄的这种住宅情况，可以想像过去这里是何等的富裕。中日战争中，特别是对美、英战争一开始，日本方面苦于日常生活物资的不足，然而，这时在这些村庄的财主家里，却拿出了令人惊异的美国香烟或美制牙膏。其来源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安然无事地继续不断。太谷是被称为中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故乡，在那里还残存着大规模的留守住宅。

具有这样历史、文化传统和近代工业的山西人的精神水平是比较高的。山西人厚道而诚实，不像山东人、东北人和南方人那样易于激动。他们的头脑很冷静，对技术的领会亦比较快。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七月，卢沟桥事变发展为全面的中日战争。日军在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之后，继续南下，而攻陷保定和石家庄的第二十师团将其锋芒西转，并从娘子关攻入了山西。第一一四师团（编者注：应为第五师团）则从北部突破平型关，经过忻口镇的激战而于十一月，攻占太原。第二十师团还从榆次南下，占领晋南，并渡过黄河同抗日军队相对峙。阎锡山则在黄

河东岸的乡宁、吉县的山中，整顿其残余部队，成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延安的朱德作为副司令长官，结成国共统一战线，抗击日军。日军就这样在此后八年中，占据和统治着山西。而且，即使是在战后，在这里的许多日本人，在因国家战败而造成的空前的厄运中，仍然想为祖国的未来尽一点贡献。正是在这个愿望的推动之下，他们把青春的热情倾注在残留山西的事业中，乃至不惜流尽沸腾的热血。而其中五百多名的日本青年在战后异常的战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今犹长眠在山西的黄土之下……。

随着战后二十年时间的推移，很多事情都被抛进了忘却的深渊。能够被流逝时光的网眼掬起而刻写在史籍上的，不过是寥若晨星，具有偶然性和稀少性。在烽火连天的山西黄土之上，战后四年间所熊熊燃烧的日本民族力量的残滓，现在最多只不过存留于相当有限的当年参加者的回忆中而已。如果现在来看这一问题，有的称其为殖民主义，也有的称其为帝国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然而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气氛来说，能够出现这样的事情也是事实。

一、残留思想的萌发

日本的崩溃日益逼近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五月，柏林陷落了。德国受到来自苏军和美、英军的东、西两个方面的、简直像用两块厚厚的铁板挤压人体那样的猛烈压力，浑身沾满了泥土和鲜血，变成黏糊糊的血饼倒了下去。希特勒的悲剧性的结局，仿佛暗示着我们自身的末日，因而感到像肋骨直接被挤压般的憋闷和疼痛。当我们看到墨索里尼被用自动手枪打死而头部朝下悬垂的照片时，还存在着同那种困境仍有一定距离的安心感，然而毁灭柏林的熊熊烈火

却使我们感到日本不久也会被毁灭的最后时刻就在眼前了。

当时我担任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我在名义上是汪精卫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招聘者，实质上是日本山西派遣军（即北支那方面军的第一军——译者）司令部的政治要员，是被安插在中国政府内部的代理人。因此，通过日本方面的情报和中国方面的各种情报，我清楚地知道日本在太平洋和缅甸失败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作出日本即将崩溃的判断。

所谓情报，大体上属于片断的局部的事实。而且因为掺杂着收集和传达这些事实者的观察和判断，甚至其主观愿望也发生一定的作用，因此送来的情报未必符合客观现实。特别是一到战争激烈之时，往往由于希望迅速使局面好转的焦急感增强，所以总想把局部有利的事实，尽可能看作是全局的事实。与此同时，则把不利的事实，尽量理解为没有价值的、仅占极小部分的事实。这样一来，就会经常出现过高地评价自己认为有利的情报，而过低地判定不利情报的现象。因此，能否进行全面的综合判断，与其说取决于情报本身，勿宁说有待于分析和综合这些情报的人们的判断推理能力。

但在当时的日本，因为有关这种思维推理的方法论的科学研究和锻炼是不够的，因此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主观主义的好胜情绪占了上风。特别是陆军，从士官学校以来就把自己看作“世界无敌的皇军”，过去养成的无条件盲目崇拜的习惯的影响没有消除，因而对自己军事力量的过于相信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仍然在做着所谓失败只是局部的问题，在全局方面最终会取得胜利的美梦。

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开始反攻，在莱特岛作战胜利后，紧接着就是仁牙因湾登陆。

美军一直向马尼拉攻击，日军撤退到附近的山中。关于这种局势，我方某一位军级的高级人员曾笑呵呵地说：“张开两臂，

敌人就跳了进来。如果切断后路，敌人就会变成袋中之鼠。美国佬就将被彻底歼灭。”然而这不过是根据“作战要务令”的纸上谈兵而已。如果略去影响于战场的复杂的诸要素，或许能得出那样的答案。然而“撤退”到山中的日军，不仅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被当地群众所敌视，处于孤立的、几乎得不到援助的境地，是我军在菲律宾的实际情况。群众的敌意是由于日军本身暴露出抢劫粮食、物资，征发劳力、家畜，杀戮、强奸等等作为军事征服者难以避免的弱点，而长期形成的。因此日军被美军击败撤退的事实，只能助长群众的反抗情绪，决不会因为对失败者的同情，而减轻敌意。因此美军的中心突破，是同日军背后的人民抗日军的军事、政治活动相配合的，而决不是在日军和群众融成一体的军事、政治大海中，突然前进的孤军。连这样的客观事实也置之不理，孤军奋战，并以纸上谈兵的方法判断局势的发展，其危险性，即使是半开玩笑也已经是暴露无遗了。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三月，传来了台湾海域海空战胜利的消息，并且在无线电广播里播放着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当时军参谋这样向我们说明：具有有限的兵力和可能沉没的美国机动舰队，被具有“无限”兵力和“不沉”优点的日本基地空军所歼灭。然而，从那时起，到过了还不到一个月的四月里，美军已在冲绳登陆。又如，有的人说，击落美国飞机百架，又有的人说，不，好像是二十架！有的人说，击沉军舰五艘，又有的人说，不，好像是一艘！类似这种议论和情报的收集，不管怎样，也是徒劳无益的。与这种牵强附会的局部事实相比，机动部队不到一个月就在冲绳登陆则是判断全局的重要资料。美军就这样日益将手伸向了日本自身躯体的一部分。欢呼台湾海域海空战胜利的军舰进行曲的梦境，很快就在舰炮射击声中破灭了。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祖国因战败而被敌军铁蹄所蹂躏以及遭到战火毁灭的情景，

从曾经看过的史书或画面中是可以想像到的，因此抑郁的阴云在内心无情地扩散着，苦涩而沉重的感觉，压迫着心脏。日本也许会像德国那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但终将被联军所占领，丧失国家的主权，而仅仅剩下被别国所控制的国土。

日本被别国占领军所控制的形势，不管日本人愿意与否，这是武力威胁下的无条件投降的唯一结果。而且这还意味着从前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恢复独立，满州、台湾归还中国，而在大陆的势力丧失殆尽。当时在海外的几百万日本人和日军是顺从地卷起旗帜、沮丧地回国呢？还是想什么别的办法把日本人的势力残留海外，以图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呢？这是在对美战争处于不利阶段、特别是在德国投降后的形势下，作为身在海外的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解决的问题。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倾注心血研究、计划并付诸实施的，主要是当时的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军参谋岩田清一和作为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的我。

残留的条件——日军的战斗力

“残留山西”的想法，并不是在柏林陷落的一瞬间，突然出现在桌子上的构想。产生这种想法并不断完善化是由于存在着那样的客观基础和有血有肉的具体条件。

当时日军的第一军占领和控制山西一带。第一军是于日中战争之初的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为攻占山西而在石家庄组建的，太原陷落并占领临汾和运城之后，即把指挥机关移至太原，从而取代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而成为山西的统治者。该军直到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一直作为第一线进攻兵团，隔着黄河与朱绍良的第八战区、卫立煌的第一战区相对峙，并处在同延安和山西一带的八路军、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军作战的最前线。因此，在这个部队中，当时拥有最优秀装备的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等三个甲编师团，再加上一个乙编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故

以其总兵力九万人的威武阵容而引为自豪。当时，吉本中将作为军司令官刚一到职，就说“我是为渡黄河而来的”，并密令进攻陕西省，开始渡河作战的准备；与此同时，我们对西安特务机关的设立和陕西省政府的建立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然而，由于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方面的战况紧急起来，这些优秀的师团便逐渐转移到南方，到战争结束前的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该军的总兵力不仅已减少到六万，而且其成分也只包含一个乙编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两个独立步兵团、一个独立警备队。由此可见，该军的素质已急转直下，一落千丈了。唯一堪称师团的第一一四师团，其步兵也是以大队（营）组成的，没有联队（团），既无炮兵联队，也无工兵联队，而完全等同于警备队或者还低于日俄战争时代组编的军队。而且，该部队从内地派来的兵员中，十分之四的人，体质极为虚弱，以至非住院就医不可，个子同三八式步枪差不多高的背着竹子水筒的补充兵也不断增加。另外，还有的是用就地征集的老兵充数的。

部队训练的松弛也是引人注目的。那时，八路军的一个军官曾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旦被日军追逐，只要追至相距三百米，就肯定会被击中，而如今即使是相距一百米，我们不愧不忙地跑，也很少被击中，所以根本没关系。”这些话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夸张，但基本上是事实。体力减弱，训练不足，武器，特别是重武器的减少，在削弱第一军战斗力方面所占的比例，比兵员数的减少更大。

但是，高级指挥官和将校们竭力保持其压倒优势的战斗力，仍旧没有放弃在日中战争初期所讴歌的“无敌皇军”的迷梦，企图仍然像过去那样，妄自尊大，为保持“皇军的威武的阵容”而费尽心机，然而，对敌战争的实践，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实力低下的现实。

八路军的战力增强

战场本是无情的世界。与日军战斗力低下的情况相反，八路军的战斗力却日益强大起来。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秋，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次挑起同日军的决战，致使从北部进攻的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遭受很严重的损失。此后，又在忻口镇发生了冲突。然而，八路军由于战斗力较差，发现从正面交锋、作战是不利的，因此实行“诱敌深入”，避免大兵团作战，而以游击战为主，只是在面临有利的地点和时期，即本身处于压倒的多数时，才相机进行决战。因此，从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到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之际，当日军一到，“八路军就都逃跑”。因此，大有一触即溃之感。

但是，八路军有时也集中大量兵力，挑起决战。例如，从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八月二日起，八路军动员约一百一十五个团（联队）四十万人，在华北一带发起大规模攻势，战斗次数达一千八百二十四次，被攻击的日军据点有三千个。致使石太、京汉、同蒲三线四百公里的铁路和八百公里的公路、一千五百座桥梁受到破坏，并使石太线两个月不能通车。

这一战役使过低估计八路军作战能力的日军大为震惊，于是将兵力集中于华北，并制订了所谓“三光政策”（因为杀尽、烧尽、抢尽的中文意思是杀光、烧光、抢光，故择其语尾“光”字而称之。日军称之为毁灭作战，即日军进入八路军地区后，使居民、房屋、农作物等一概不留，以剥夺其生存条件）。以后几年是八路军的逆境时代，因此，一遇到具有压倒优势的日军的攻击，八路军决不拘泥于地区的占据，而是实行大胆的退避。但对日军孤立的小部队，则实行突然袭击，以使战斗力的比重逐步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另外，在此期间，八路军也逐渐积蓄了实力。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八路军的正规兵力已达四十七万，